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21年9月16日 (第245期)
仅供参考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美学者建议美将基础设施纳入国内和外交政策

美国应从中国的基础设施政策中汲取经验教训，在拜登基础设施计划的基础上，制定一项综合的国内基础设施政策，但同时也必须将基础设施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中美关系

中美保持军事沟通顺畅意义重大

美国《政客》(Politico)网站9月1日载文称,美国国防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8月27日进行了拜登上任以来的首次接触。中美两国军队建立更好、更规则的沟通方式对于阻止两国未来在印太地区可能发生的冲突很有必要。

文章称,在印太地区,中美两国军队之间的不信任程度很危险。不断增加的紧张局势使很多美军高层人员和国防部官员表示,他们“缺乏阻止冲突的外交工具”。两国国防部2008年同意建立一条双边国防热线,该热线包含“危机局势”沟通指南。但有专家表示,在太平洋地区发生无法预见的事故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面对这样的局势,这条很少使用的热线是不够的。

美海军陆战队退役中将华莱士·格雷格森(Wallace Gregson)称,中美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指挥官缺乏与彼此的直接联系,这样的联系能帮助阻止或缓和两国之间可能的军事冲突。前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科特·斯威夫特(Scott Swift)认为,应该对目前双边军事危机沟通的顺序进行反思,以避免两国军队在太平洋地区发生的事故带来灾难性的“意外后果”。他正与退休的中美政府和军队高级官员进行非正式的秘密对话,以为双边军事危机沟通开发更有效的模式。

CNAS: 美应制定新的战略方法来应对技术竞争

美国《国会山报》(The Hill)网站9月7日登载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技术和国家安全计划研究助理梅根·兰博斯(Megan

Lamberth) 等的文章称, 中国的崛起给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的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安全构成深刻的挑战, 美国必须制定一项新的技术政策, 以促进美国的优势, 并利用其联盟和伙伴关系。

文章称, 美国领导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需要制定一项新的技术政策, 也在逐渐接近阐明这一战略。但仍有两方面的因素未得到重视。首先, 为了制定、执行和监管一项国家技术战略, 联邦政府需要进行必要的官僚和组织改革。拜登政府应成立一个技术安全工作组, 以汇集来自众多研究技术政策和供应链安全相关问题的政府机构的代表。其次, 美国政府还需要健全的监测和评估程序, 以评估当前的技术能力, 并预测美国在近期和长期应优先考虑哪些技术。

实施一项技术战略意味着还需要进行其他变革。美国商务部在全球技术竞赛的关键方面日益处于前沿和中心地位, 必须扩大商务部的权力, 以使其能有效地履行使命。首先要解决商务部在财政和人力等资源方面的限制。国会和白宫应该利用国防预算为商务部的某些项目提供资金, 如与军事有关的出口管制和反扩散项目。国会还应重组并扩大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的职能。虽然工业和安全局到目前为止主要关注出口管制, 在经济安全与国防交叉的领域, 其可以应对更多挑战。

美学者预测未来十年中美冲突的走向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9月8日登载美国帕特森学院助理教授罗伯特·法利(Robert Farley)的文章称, 中美两国的规划者必须考虑两国的力量平衡随着时间的流逝将会发生何种改变, 并认真考虑冲突的可能性。文章摘要如下:

虽然中美两国有各种小冲突, 但并未上升到开战的程度。然

而，到 2030 年两国的力量平衡和战略格局可能会变得非常不同。冲突的核心仍然没有改变。即使美国继续制定全球国际秩序的规则，中国的力量似乎仍不可阻挡地增长。但中美双方都不会因为一件小事开战。可以设想，如果中国与美国的盟友——无论是日本、韩国、印度、台湾地区，还是菲律宾——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几乎肯定会被卷入其中。

虽然战场将取决于冲突的起因，但可以预料，关键战场将在中国的东海和南海。这将凸显两国各自的空军和海军能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 12 年中，军事平衡将变得对中国有利。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会有优势，但与现状相比，时间对中国有利。美国海军仍将拥有优势，但这种优势将越来越小。在空军力量方面，中国的现代化计划还不足以使其在 2030 年达到美国的标准，但解放军空军将缩小差距，并将拥有充足的基地和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防空导弹设施的优势。

中美在社会、经济和军事上都紧密相连，并且都高度依赖网络连接。这种连接的严重中断可能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然而，一些网络冲突的分析者认为，在中美变得更加依赖互联网之际，加强连通性的结构也变得更有弹性，更不容易遭受破坏。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不会包含网络成分；相反，数字战争可能会更多地涉及军事方面，而不是民用方面。能最好地将网络攻击和现实世界的军事行动结合起来的一方可能会获得最终胜利。

即使到 2030 年，中国也不太可能拥有对美国工业和发动战争能力构成永久威胁的常规能力。另一方面，也越来越难以想象美国会对中国造成致命的破坏，因为失败可能会造成持久的政治危机。美国应该思考，随着时间的流逝，美中之间的力量平衡可能会发生怎样的改变，以及两国的机会之窗会如何出现，并认真对待两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美企反击美政府和国会的反华努力

美国《政客》杂志近日载文称，美国企业巨头正努力与国会和拜登政府的反华情绪斗争，以避免国会和政府出台可能伤害他们在中国开展业务能力的措施。文章摘要如下：

自今年春季以来，包括美国商会（USCC）、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BC）、全美零售联合会（NRF）等游说团体一直在发起活动，反对美国国会和白宫为应对中国“侵犯人权”而强化贸易和金融法规的举措。这些团体担心，贸易打击可能会抑制美国企业已经在中国进行的投资。它们的游说旨在推翻拜登政府和国会领导人倡导的一些最为激进的贸易限制措施。

目前，代表着数百家美国大企业——包括亚马逊、摩根大通和耐克——的团体已经使议员们否决了一项要求政府对美国在华投资进行审查的法案，削弱了众议院一项一揽子立法中的反北京言论，并在一项反对“强迫劳动”的法案中加入有利于企业的条款。但是，这些法案都还没有最终敲定，大型商业团体担心，一旦秋季立法会议开始，他们将无法依赖自己的传统盟友。

共和党人要么为拜登对中国的强硬立场欢呼，要么推动他走得更远，这使得一些游说者只能转向进步人士。近来，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已经与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和一些反战团体接触。商业团体和进步人士认为，美国可以在不关闭商业或合作的情况下，让北京为“侵犯”人权和贸易的行为负责。

拜登政府保留了其前任大部分激进的贸易政策，这让业界非常懊恼。企业的游说者试图减弱国会和拜登政府在经济上对北京越来越激进的举措。

企业游说团体担心政府的行动将导致其成员减少他们在中国的商业利益。这不仅会损害他们的底线，还会削弱美国在迫使中国改变其“侵犯”人权行为方面所能发挥的微弱影响力。

企业还试图将他们的游说努力，与进步宣传团体反击新兴的中国论（emerging China doctrine）的方式相结合。他们担心，更加强硬的美​​国路线将使美国在未来几十年里增加军事开支，加剧紧张局势，并有可能升级为地区战争，甚至更糟。

但是，企业和进步派之间刚建立的联盟并不稳固。总的来说，进步的立法者和活动人士对企业递来的橄榄枝持怀疑态度，他们通常认为这些企业在经济和环境法规方面不负责任。

游说团体和活动家们将不得不加快脚步，以在秋季立法季到来之前塑造讨论。在很多方面，企业都在与政治潮流作斗争。共和党人抓住中国问题不放，试图把拜登描绘成在外交政策上的软弱者，而民主党人则回应称，拜登与特朗普相比并没有多大变化。

美国外交

CSIS 称美国应与塔利班共处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网站近日登载该中心阿莱·A. 伯克战略项目主席、前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阿富汗问题顾问安东尼·科德斯曼（Anthony H. Cordesman）的文章称，美国不能简单地忽视或惩罚塔利班，而应与塔利班共处，关键是将美国与塔利班打交道的每一步都与符合美国、阿富汗人民和塔利班利益的条件结合起来。文章摘要如下：

与塔利班共处不仅充满风险和不确定，也相当困难，但这或是目前美国缓和塔利班行为、保护阿富汗人民、限制塔利班包容极端主义运动和恐怖主义风险的最佳选择。美国不能简单地忽视或惩罚塔利班，这会加重这一人类悲剧。塔利班也必须承认，要建立稳定的政府和真正的安全，并持续下去，就要对 21 世纪做

出足够的让步。

美国不必牺牲其价值观以与塔利班共处，关键在于美国与塔利班打交道的每一步都与符合美国、阿富汗人民和塔利班利益的条件结合起来。例如，重开大使馆以帮助一些阿富汗人、留下的美国的人和盟友的公民，这并不等于忽视塔利班如何对待人权或宗教自由。要求塔利班保证大使馆安全，允许阿富汗人和其他人离开，以此换取美国限制对塔利班的制裁和开放合法贸易。允许塔利班使用阿富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储备和国际金融体系，提供有限的经济援助，都可以作为交易条件。如果美国与盟友和伙伴合作创建某种国际方法，将更加有效。

如果塔利班拒绝在合理的基础上进行谈判，美国及其盟友将在阿富汗政治中幸存的温和分子、阿富汗人民和外部世界中获得更多可信度。在各国看来，美国已经向塔利班提供了一个可行的选择和机会，因此未来任何危机或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军事行动都是合法的。

美在中东的外交政策寻求新平衡

美国进步中心（CAP）网站近日登载该智库研究员布莱恩·卡特图利斯（Brian Katulis）等的文章称，美国从阿富汗撤军表明，拜登政府寻求降低其在整个泛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

文章认为，就中东而言，拜登政府前六个月主要关注限制美国在该地区的直接参与。拜登政府新中东团队一些成员的口号是“不再有失败国家”，这表明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追求温和务实的目标。

展望未来六个月或更久，美国可能会在三个主要问题上面临挑战。首先，在伊朗及其代理人继续威胁美国军队和美国伙伴之

时，与伊朗就恢复核协议进行的外交努力还未产生突破。其次，以色列与其一些邻国之间目前的紧张关系，包括加沙地带的哈马斯、黎巴嫩的真主党以及在叙利亚领土上活动的一些团体，可能会爆发更广泛的冲突。应对这两个问题，并加强稳定、减少来自倒退团体的威胁，将是拜登政府在中东地区面临的一项重要战略挑战。再次，该地区面临的最新挑战是长期的人类安全挑战，包括新冠疫情，席卷该地区的热浪，以及迫在眉睫的气候危机，这可能会带来更多暴力和动荡。

总之，2011 年在中东和北非主要地区引发民众起义的条件仍然存在，因为压倒性的经济、社会、政治和人类安全需求可能会引发变革运动并产生不稳定。这些挑战为美国提供了机遇，重新调整其与中东的整体接触，将外交放在更优先的位置，并以平衡的安全战略为后盾，更加注重更广泛的人类安全问题。这些问题将影响该地区，并不可避免地影响更广泛的国际体系。

兰德公司建议美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威慑力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 9 月 3 日登载该智库高级政治学家斯科特·哈罗德(Scott W. Harold) 的文章称，美国应增强在印太地区的威慑力，以减轻从阿富汗撤军对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负面影响。文章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美国应定期、始终如一地重申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战略逻辑。拜登有关撤军的讲话清楚地表明，减少对阿富汗代价高昂的承诺，能使美国更好地在亚洲等地区捍卫核心联盟和利益。美国国家安全团队可以定期地向台湾地区、韩国等其他亚太盟友重申这一承诺。

其次，宣布提高威慑力的针对性措施。例如，加速开发和部

署“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等更具适应性的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信息、监视和侦察架构(C4ISR)；宣传美国采购或预先部署更深层次和多样化的远程反舰巡航导弹和其他精确制导弹药。美国国防部可以加快开发和部署大量不同规模、不同类型和执行不同任务的无人平台，使指挥官能够应对更大的风险，在角逐日益激烈的地区展开行动。

再次，除了在短期内增强对美国军事威慑力的信心外，亚洲伙伴将寻找美国投入与中国长期竞争的信号。为此，华盛顿可以加快部署提升影响力的举措，比如“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向东南亚提供疫苗援助，或与日本等盟友推广可靠的 5G 解决方案。维持那些与美国有合作的人对美国的信任感也至关重要。

阿富汗撤军将影响北约和跨大西洋关系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近日登载了该中心欧洲、俄罗斯和欧亚项目副主任兼高级研究员雷切尔·埃勒胡斯(Rachel Ellehuus)等的文章称，阿富汗撤军不会危及跨大西洋联盟，但它暴露了欧洲战略的局限性和北约适应新形势的必要性，可能对欧洲、北约和跨大西洋关系产生直接而长期的影响：

第一，当美国基于国内政治考量而非地面状况决定撤军时，很多欧洲国家感到美国仅是告诉他们了这个既成事实，而未与他们进行多少协商。在短期，许多欧洲国家担心仓促从阿富汗撤军将产生不稳定的影响，直接危害他们的安全利益。随着阿富汗政府的垮台，欧洲领导人正在做最坏的打算，例如国际恐怖组织在阿富汗的崛起，为无序移民涌入做准备。还有一些人担心非法毒品贸易增加、移民压力导致欧洲民粹主义抬头。虽然美国也要应对这些影响，但地理位置使欧洲在这些问题上首当其冲。

第二，喀布尔混乱使欧洲展开了一场更大的有关美国全球可信度的讨论。但喀布尔的危机不太可能影响北约第五条款的效力，也不太可能动摇盟国共同应对挑战的需求。它不会削弱美国的承诺，反而可能迫使华盛顿极力证明美国对北约的坚定不移。

第三，阿富汗危机暴露了欧洲的软弱和美国的疲乏。对欧洲来说，这暴露了欧洲无法改变美国的决策考量，也无法在没有华盛顿支持的情况下捍卫自身利益的事实。对美国来说，这表明尽管它期望欧洲在其周边地区承担更多安全和防务责任，但大多数欧洲国家仍缺乏这样做的政治意愿和能力。

第四，这或许会推动欧洲团结一致。欧洲人对提高欧洲安全和防务自主能力的支持正在逐渐增加。欧洲国防预算自 2015 年以来不断增加，并提出了一些雄心勃勃的项目，来刺激协同武器项目合作或加强集体作战准备。

第五，阿富汗危机可能改变北约和跨大西洋合作。一种可能是，阿富汗危机将促使北约加快将重点从地区外的危机管理转向集体防御。盟国可能对于参与行动的时间和条件更加审慎，特别是在依赖美国资产的情况下。由于北约以协商一致为基础的决策机制和现有部队的组建程序繁琐且缺乏灵活性，美国的盟友未来可能会倾向于更灵活的自愿联盟。

美外交政策回归现实主义

美国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网站 9 月 3 日刊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埃里克·波斯纳（Eric Posner）的文章称，驻阿美军的撤离标志着美国“通过大规模军事行动改造他国的时代”行将结束，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开始与理想主义分道扬镳，回归现实主义。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外交政策的理想主义传统——又称“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始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时期，并于上世纪 90 年代达到顶峰。自由国际主义者认为，美国应使用军事和经济力量迫使其他国家接受自由民主并维护人权。

无论是在理念上还是实践上，美国的理想主义都拒绝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Westphalian international system），后者主张禁止国家干涉他国内政，并认为均势是实现长久和平的前提。威尔逊试图以国际机构监管的普遍正义原则取而代之。在二战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在 1941 年的《大西洋宪章》中重申了这些理想，将自决、民主和人权列为美国加入战争的目标。然而，到了冷战时期，美国追求“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聚焦国家利益，支持和容忍某些独裁国家，只要它们反对苏联。

经历了越南战争带来的军事和道德灾难之后，吉米·卡特总统和美国国会试图为美国外交政策引入一个道德中心，并使用人权的言辞。到了罗纳德·里根时期，人权成为了美国在舆论上打击苏联的固定话语。但在行动上，这两位总统依然支持反对苏联的独裁国家，也没有利用军事干预来推进美国的人道主义理想。

冷战后，作为唯一的全球霸主，美国以国家安全和人权为由，进行了一系列军事干预。美国对国际法和法律机构兴趣大增，多个国际法庭被建立起来，人权条约和相关机构得以复兴或加强。

在拜登就阿富汗撤军发表的讲话中，他反复强调明确和维护美国“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性。拜登还称，人权将仍然是“我们外交政策的中心”，美国可以使用经济和道德劝诫的方式来推进人权。该言辞与其宣称“核心国家利益”应该决定军事干预的说法相冲突。很明显，在美国外交政策中，人权和其他道德力量被降级了。唯一的问题是，美国是否会缓和措辞以符合新的现实。

美国政治/其他

民调显示美国人更加警惕政府监控

美联社网站 9 月 7 日发布美联社-北卡罗来纳公共事务研究中心(The Associated Press - Norc Center for Public Affairs Research)的一项新调查显示, 美国人越来越不愿接受政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进行的侵入性监控, 他们认为国内极端主义比国外极端主义的威胁更令人担忧。文章摘要如下:

这项民调显示, 过去十年来, 对旨在监控国外电话的监控工具的支持有所下降。46%的美国人表示, 他们反对美国政府通过阅读美国境外人员之间的邮件来应对针对美国的威胁; 27%的人赞成这么做。这与美联社-北卡罗来纳公共事务研究中心十年前进行的一项民调差异明显, 当时 47%的人赞成, 30%的人反对。

两党都对监控范围和美国当局拥有的广泛情报收集工具感到担忧。美国人也更有可能反对政府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窃听美国境外的电话。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继续反对美国政府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监控美国境内的电话、电子邮件和短信的可能性。约一半的人反对政府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对互联网搜索进行监控。尽管对监控存在普遍担忧, 但 60%的美国人支持在公共场所安装监控摄像头来监控潜在的可疑活动。

民调还显示, 美国人更关心国内的极端分子, 而不是国际极端组织。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表示, 他们非常担心来自境内极端组织的威胁。相比之下, 约一半的人表示, 他们非常担心来自外国激进分子的威胁。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更有可能担心本土威胁。大多数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还担忧错误信息的传播对美国构成的威胁。

美调查记者撰书回顾特朗普执政的最后一年

近期，美国记者卡罗尔·列欧尼和菲利普·洛克尔出版新书《我自己就可以解决：唐纳德·特朗普灾难性的最后一年》（*I Alone Can Fix It: Donald Trump's Catastrophic Final Year*）。两位记者均为《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拥有多年华盛顿政治事务报道的经验。

《我自己就可以解决》将全部目光聚焦在特朗普任期的最后一年，因为各种因素，这段时期成为特朗普政治生涯及美国历史上的“黑暗时期”。本书按照时间顺序和重要事件分为四个节点：2019 年新年之夜特朗普政府内部得知中国出现新冠肺炎病例的消息；2020 年 5 月 25 日乔治·弗洛伊德之死；2020 年 8 月特朗普政府对新冠疫情持续发展的回应；以及 11 月大选期间特朗普逐渐败退的选举细节。

书中包含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记录之一是 2021 年 1 月 6 日的国会暴乱。本书对此事的刻画，不仅将事件的发展浓缩到了细致的时间节点，更是直接引用包括总统家人、副总统彭斯、罗姆尼在内的白宫各利益相关方的第一手回应，全面还原了历史场面。本书聚焦的主题是特朗普节节败退的原因。其中，史无前例的新冠疫情成为了特朗普连任路上最大的阻碍。在本书结尾，作者暗示，特朗普作为前总统的影响力还在美国社会延续。

总体而言，本书作为一部记叙性政治书籍，给予了读者丰富且生动的信息量。然而对于政治事件的核查和深度剖析有所欠缺，使得本书停留在新闻汇总与回放的层面。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书名《我自己就可以解决》来自于特朗普的真实语录：“我是你们的声音。我自己就可以解决。我会将法律和秩序重新还给美国”。这句话在特朗普执政的最后一年里显得颇具讽刺意义。

布鲁金斯学者反思美国对“9·11”事件的应对

布鲁金斯学会网站近日登载该学会治理研究高级研究员威廉·高尔斯顿 (William A. Galston) 的文章称, 相较于 20 年前, 现在美国更弱、更分裂、更不受尊重, 也让出了美国当时享有的无可挑战的卓越地位。虽然美国对“9·11”事件的应对不是造成这些负面事态发展的唯一原因, 但它确实产生了影响。

首先, 连续四任总统的误判导致美国忘记了其在阿富汗的目的, 在错误的前提下入侵了伊拉克, 在叙利亚跨越了自己的红线, 与塔利班签署了相当于投降协议的协议, 并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离开了喀布尔。美国对中东的过度关注导致它忽视了其他正在改变世界的地缘政治力量。当美国将目光投向别处时, 俄罗斯复苏了, 中国崛起了, 并对世界和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在美国必须以被削弱的实力面对这些后果。

其次, 美国的信誉遭到削弱。入侵伊拉克造成了美国和欧洲之间的严重分歧, 放任叙利亚屈服于俄罗斯的影响力让世界怀疑美国追求目标的决心, 匆忙离开阿富汗甚至让美国最亲密的支持者感到愤怒和悲伤。

再次, 美国国内的党派分歧愈加严重。对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袭击本应该使整个国家团结起来。一开始确实如此。小布什总统对恐怖分子的有力回应赢得了两党一致的赞扬, 他为防止美国穆斯林被妖魔化所做的努力也被证明非常有效。然而, 随着关于如何对待在押人员和入侵伊拉克的争论升级, 团结让位于激烈的相互指责, 这加剧了美国人对政府的不信任, 削弱了人们对外交政策、国防和情报专业知识作用的信心。

最后, 美国在“9·11”事件之后做出的政策选择也使其付出了巨大的机会成本。自 2001 年以来, 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直接作战成本约为 2 万亿美元。根据一项估计, 两场战争的总

成本约为 4 万亿美元，这还不包括治疗战争给美国军人造成的身体和精神损害的“长尾”支出（long tail outlays）。

与此同时，美国未能通过增税来为“9·11”事件后的军事行动提供资金，这导致美国的债务压力越来越大。如果当初美国对本土遭受的袭击做出更慎重的反应，美国的国内情况将会更好，也会更加安全。

文章称，美国应该翻过“9·11”这个篇章，将在中东的政策限制在捍卫盟友和美国的基本利益上，然后将注意力集中现在摆在美国面前的任务上——在国内外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美国进一步衰退，并在 21 世纪塑造世界秩序的斗争中保持竞争力。

美学者建议美将基础设施纳入国内和外交政策

美国应从中国的基础设施政策中汲取经验教训，在拜登基础设施计划的基础上，制定一项综合的国内基础设施政策，但同时也必须将基础设施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ilson Center）发布纽约大学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萨德克·沃赫拜（Sadek Wahba）执笔的报告称，美国应从中国的基础设施政策中汲取经验教训，在拜登基础设施计划的基础上，制定一项综合的国内基础设施政策，但同时也必须将基础设施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一部分。报告摘要如下：

任何一项长期战略都需要一项国内基础设施政策，该政策不应依赖短期筹资机制，而应依靠不受拨款风险影响的长期解决方案。它不仅需要私人国内资本，还需要外国资本，后者在国际投资中积累的在基础设施方面的经验将是宝贵的。该政策还应该

避免为了纯粹凯恩斯式的财政刺激而投资基础设施，因为有其他更有效的手段来实现此类财政刺激。报告认为，一项新的基础设施政策应包含以下关键项目：

资助国内基础设施

拜登政府提出的基础设施计划主要依赖提高企业税率和其他税收措施，但把税收作为唯一的解决方案是不够的。仅依靠政府支出也难以成功，除非是为了短期效益。拜登政府有一个难得的机会来开启美国生产力的新时代，并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第一，创建一个实收资本为 1000 亿美元的美国基础设施银行，该银行可以以 10:1 的比率借贷，筹资一万亿美元的永久资本，而不用增税。第二，在州和地方层面提出能力建设倡议。作为基础设施银行的一部分，或通过美国市长会议等其他机制，为负责设计和实施美国各地数百万美元项目的州和地方机构提供技术帮助和支持。第三，鼓励发展公私伙伴关系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这将允许私人部门——包括国内和外国资本——对已确定的项目进行投资。第四，鼓励发展公对公伙伴关系 (Public-Public Partnerships)。美国的各养老基金管理的资产超过 18 万亿美元，能从基础设施投资中获得巨大利益。

该建议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制定一项连贯的外交政策战略，提高美国的全球地位，支持国内和国际基础设施投资。支持这一战略所需的行动包括：邀请外国退休基金投资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邀请外国资本投资美国基础设施银行，邀请关键的外国盟友参与创建美国基础设施银行；取消阻碍外国资本投资美国基础设施的税收；拜登政府和国会或许可以考虑邀请中国公司投资美国的基础设施，但必须在与中国达成全面协议的背景下进行。

资助美国的国际存在

在外交政策方面，美国需要采取一系列关键措施来重建其全球地位。

第一，重建美国的国际开发金融机构。立即采取行动巩固现有的机构，对这些机构进行强有力的治理，给它们清晰的授权和足以与中国竞争的资产负债表。第二，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设立一个负责基础设施协调的职位，该职位将在美国不同部门之间进行协调，并制定一项综合的方法来实现美国的目标。第三，将基础设施特有的标准纳入美国国际气候融资计划（ICFP）。气候变化与基础设施投资有着复杂的联系，拜登政府可以制定基础设施项目标准或为基础设施制定独立的补充融资计划。第四，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中与中国在合作的同时竞争，而不是冲突。美国应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合作，使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积极贡献者；并应与日本一道加入亚投行（AIIB），在该机构内开展工作以确保其符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积极反对不符合国际标准的项目。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